

卷头的预白

(一) 这本记载是从民国十四年七月起 至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止。中间少不免还有大事漏了叙述 但凡我没有参加 或者不是亲自与闻的，恐怕犯了以耳为目的弊病，不敢强以不知为知，一概从略。至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中日战事发生后 更有许多大事 那我打算另写一本专书 在此也不枝节地再提。这本书写成以后 还有大事继续发生 是不是我还补述呢 我目前也没有这样计划。

(二) “盖棺论定”四个字是中国人臧否人物的忠恕之论。这本书是写成于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天，以后书中人物必定还有变化的，但我再不等他们去盖棺，我就以今日我认定的是非是非。他们若再有变化 有机会时只好另写一篇文章去叙述 我决定不再变更这本既成的记载。

(三) 书中有两位先生我对他们是称先生而不名，一个是汪精卫先生，他是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又是国民政府的创业者，所以我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一个是蒋介石先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领袖 也是统一中国的大功者 所以我也常称他为先生而不名。自然我对于他两位都难保无微词，尤其对于蒋先生不满，但我依然对他们表示尊敬。

(四) 中国人的名字最难记忆 他们有大名 也有别号 往往有人知一个人的别号 而不知他的大名 也有人只知一个人的大

名 竟直不知他的别号。书中有许多人物 我只唤他们别号 原因不是我故意谦抑地代他们讳名 而是我对他们太熟了 平时叫顺了口 提笔记载时 似乎叫他们大名 反而觉得太生硬。这本书出版一定距离写书的时间很长很长的 恐怕年代湮远 读者不一定知道某人别号就是某个大名 我所以不惮烦地照着笔画 原书为繁体字 的顺序 编定一个名号表 至于我单写他们大名的，那就不再烦赘。以下是一个名号表：

王法勤号励斋	王宠惠号亮畴	孔 庚号雯轩
孔祥熙号庸之	古应芬号勳勤	白崇禧号健生
朱培德号益之	朱晖日号步云	朱家骅号骧先
伍朝枢号梯云	李济琛号任潮	李宗仁号德邻
李章达号南溟	李品仙号鹤龄	李 江号冠洋
李烈钧号协和	李福林号登同	李文范号君佩
李 铭号馥荪	何应钦号敬之	何 键号芸樵
狄 膺号君武	吴鼎昌号达铨	沈鸿烈号成章
林 森号子超	居 正号觉生	胡汉民号展堂
胡宗铎号今予	胡 瑛号经武	陈济棠号伯南
陈铭枢号真如	陈 诚号辞修	唐生智号孟潇
唐绍仪号少川	徐景唐号赉陶	徐永昌号次辰
徐 谦号季龙	孙 科号哲生	夏 威号煦苍
马超俊号星樵	陶 钧号子今	张人杰号静江
张 继号溥泉	张发奎号向华	张定璠号伯璇
张学良号汉卿	张 群号岳军	张治中号文伯
黄 实号蘅秋	黄 郛号膺白	黄绍竑号季宽
黄镇球号剑陵	邹 鲁号海滨	许崇智号汝为
冯玉祥号焕章	商 震号启予	鹿钟麟号瑞伯

郭泰祺号复初	傅汝霖号沐波	傅作义号宜生
程潜号颂云	覃振号理鸣	叶恭绰号誉虎
彭学沛号浩除	经亨颐号子渊	贾景德号毓儒
邓演达号择生	邓世增号益能	赵不廉号芷青
熊式辉号天翼	刘文岛号尘苏	刘兴号铁夫
刘峙号经符	刘骥号菊村	刘维炽号季生
鲁涤平号咏鑫	蒋方震号百里	蒋光鼐号景然
薛岳号伯陵	薛笃弼号子良	蔡廷锴号贤初
阎锡山号百川	谢持号慧生	戴传贤号季陶
萧振瀛号仙阁	谭延闿号组安	罗文干号钧任
顾维钧号少川	龚浩号孟希	

第 一 章

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夕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于十四年七月一日，现在虽然不列入于国家纪念日，而在政府方面每年都有照例的纪念，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似乎还没有四月南京政府成立那样深刻。倘使没有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自然也连带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只是历史是人造成的，而有时历史也会被人抹煞的，现在人们似乎对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的印象很模糊，其原因就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们极力想抹煞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那一段艰难缔造的历史。

在孙先生逝世之前，本已拟定成立国民政府的方案，无如当时大元帅所占的地方仅仅得一个广州市，在东江方面有陈炯明统属下的林虎和叶举军队，在南路方面又有陈炯明统属下的邓本殷军队，北江虽然有谭组安先生的湘军和朱益之先生的滇军，西江虽然有李任潮先生的第一师，可是都有些残破，力量未能充实。就是广州市罢，那时还有著名的杨刘军队，所谓杨刘军队就是云南杨希闵和广西刘震寰的队伍，他们自从由广西东下，便盘踞着广州，把小小一个广州市划区防守，不过他们划区并非为着军事需要，而为着开烟和开赌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既在烟赌，对于大本营的命令是绝不服从的，这样大本营还不能算健全，怎样可以改建国民政府？

说至此地，我可以回述我个人回国的经过了。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廿九抵美国的纽约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整整研究了两年，于十四年二月八日离开纽约取道欧洲回国。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伦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負責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决心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我既有了旅费，遂定于二月八日离开纽约往伦敦，经过柏林、巴黎，而抵罗马时，知道孙先生已在北京逝世。我原想更往东欧一游，至是恐怕广东又有变动，只好将原来计划变更，就在义大利的纳波里登船，直航归国。

我到广东的时候，已是四月中旬，那时汪先生随孙先生北上，孙先生逝世之后，他病在上海未归。而廖先生则因东江初平（那时蒋介石先生已带黄埔军队占领潮汕，是为第一次东江之役）也往了潮汕，只有胡展堂先生以省长资格，那时他接了廖先生省长之任，兼代大元帅职务，留守广州。我和胡先生是不大熟悉的，因是我只往广东大学找邹海滨先生接了一次头，在家整理

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

不久汪廖两先生都回到广州了，他们告诉我大本营是不能号召的，必得要改组国民政府。不过国民政府成立的先决条件必得将杨刘两军队收平，否则不独政府命令不能出国门，恐怕还不能出府门，这样虽然把大本营改组了国民政府，也恐于事实无益。

那时国民党的兵力太弱了，要夺回广州市，势必放弃东江，但两利相权取其重，只有命令蒋先生回师会同湘滇两军来消灭杨刘军队。杨刘在广州也实在太胡闹，除烟赌之外，什么也不管。广州差不多每一条大街都有烟赌，他们的军队就是烟赌馆的卫兵，官长则淫乱骄奢，士兵则荒纵横悍。这样的军队不除，国民政府真无从成立，国民革命也无从谈起。

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

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地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会从事政治。

“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廖先生问。

“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没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我说。而且我当时对于教授很感兴趣，对于广州的政治实在看得太不顺眼。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廖先生这时对我有点失望，但依旧带着希望的神气。

“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我还肯定地说。

“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

“自然要想办法。”

“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

“自然非有组织不行。”

“你看国民党有没有希望？”

这一问太难倒我了。平心而论，当时国民党虽然已改组，但离所谓“组织性”还远。我只有说：

“怨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

“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地批评，而不肯努力地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那时廖先生已把握着我的辩论弱点，直接采取攻击的姿势。

“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着了。

“我们不要你教书，要你入中央党部。我和你约约，我们失败一起的失败，我们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希望你立刻答应我。”廖先生很兴奋，那时他站起来，很像不答应就要决斗。

“好 我答应你 从今日起我将我的身命交给党便了。”我不犹疑地说。

我既决定我的命运 我们便开始谈到包围广州的计划 谈到宣传的方法 谈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及其一切。我反复提出‘廉洁政府’的口号和决心 否则不能做到廉洁政治 国民政府虽改组 依然不能号召 因我迷信‘事实胜于雄辩’的真凭实据 徒事宣传 羌无故实 是没有用的。廖先生很赞同我的意见 那样我便决定了即日开始工作。

这次消灭杨刘的计划 实在并不怎样困难 因为杨刘的军官和士兵都有了钱，根本没有打仗的决心，东江回师的遣将调兵，成了公开的秘密，杨刘始终没有什么军事准备。大本营本来设在河南的士敏土厂 省政府也临时移驻那里办公 我们日夕往来于河南省城之间 杨刘像睡着了一样 并不加以干涉。我替大本营作了两篇文告，一篇是本着中央党部决议案，宣言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一篇是力辟中国国民党共产化的谣传。我送了这两篇文告过士敏土厂，想想政治的事已了，以后完全是军事行动 我遂送母亲到香港暂住 因为我家适居于城内炮火应该集中之地 我不想老人家担受惊恐 所以送她至香港。

我原想到了香港便赶回广州，但到了香港便碰着两件大事。第一件上海已有了五卅事件 省港正酝酿着响应 预备作政治罢工。第二件香港政府因预防罢工 特别注意于国民党所办的《新闻报》，因此新闻报馆被搜查，该报的社长陈秋霖也因此入狱。对于香港罢工 我正注视它的发展 而秋霖入狱 我为公谊私情，都难得猝然回广州。因此汪先生在我离广州后找我参加宣传，我也不能回粤工作。

杨刘的军队不几天便消灭了，除了杨军旅长赵成梁被炮轰

毙之外 其余的官兵不是归附就是逃亡。不过我在香港时 知道为着消灭杨刘，国民党的最高干部已起了破裂。有一天我碰见邹海滨先生，我非常骇异的，他也住在香港。我那时还没有官守 居住哪里都不成问题 而邹先生是中央党部的常务委员 又兼着秘书处的职务 在那时军事正在紧张时候 怎样可以优游地住在香港？

“邹先生 你为什么来香港？”我很惊诧的。

“这次军事 我真不愿意过问。他们既然主张打 让他们打便了 我是不愿参加的。”邹先生很安闲地回答 而且带点不大高兴的神色。

打杨刘不是最高干部决定的吗？邹先生是常务委员，岂有不参加决议之理 邹先生这样说 我知道里头必定有文章 我虽然不好再问下去，我心里总是怀疑满腹。这段哑谜直至我回广州之后才了然 因为最高干部对于杨刘还有轻重之分 对于打杨是一致的 而对于刘震寰 最少胡先生和邹先生不赞成用武。当时为什么要打杨刘呢 除了他们违抗命令 包庇烟赌之外 杨希闵已和北京段祺瑞有了默契，刘震寰也到过两次昆明和唐继尧联络 希图打倒国民党而做广东省长。在最高干部会议之时 胡廖两先生主张各不同 胡先生主张单打杨 而廖先生则极力主张对于杨刘一起解决。两个人争执了许久，胡先生拗不过多数的意见 只好服从决议。胡先生的主观和个性本就很强 而且他的脾气是很喜欢卵翼几个军人作撑腰之具。他对于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名义上以代帅的资格主持，但实际上不大愿意过问的。有一次正在军事紧急时期，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有人问胡先生怎样处置 胡先生冷冷地回答：“我不管 你们问仲恺和加伦罢。”照这样态度，那么海滨先生宣告中立也是不足为怪的。

杨刘救平之后 汪先生为着别的事故到香港来 要我即日到中央党部办事。我告诉汪先生我正在等秋霖出狱，否则我难于回粤 所幸没有几天秋霖已被释放 这次算是递解出境，《新闻报》也复版无期 我和秋霖一起回广州了。

我在中央党部任什么事呢？廖先生告诉我，打算在中央党部添设一个书记长。其时中央党部的制度，在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中推选九人为常务委员，而在常务委员之中又推出三人组织秘书处，秘书处只有书记一人秉承那三位秘书办理日常公事。那种制度自然不大方便 因为常务委员都很忙 每天能来办公不过两三个钟头 书记又只能起草文件 无法提挈秘书处的事务。而且中央又有好几部 所有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等 每日都有事接头 常务委员既不常在 而书记又无权处理 故有书记长设置之必要。其实当时书记长也是为我而设的 说到办事 还有许多棘手。因为我当时既非中央委员 对于各部事务也不见得都能指挥和联络 我也知道办事必感困难 只是汪廖两先生既恳恳切切的要我干 我不好知难而退立刻辞谢。

杨刘军事既告救平，国民政府的组织便马上着手。汪廖两先生嘱我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条例，定期于七月一日国府和省府同时就职。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广州‘六二三’的奇变又已来临。原因是民众为着响应上海五卅事变 游行示威 至沙基时英兵开枪 屠杀民众 又闯下了一场大祸。因着这次事变 更促成历史有名的省港大罢工 直至我们北伐进至长江流域 国民政府将近北迁，此事才勉强告一段落。

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两日 我在中央党部办公室 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于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弹劾文，说国民政府成立是

一件非常的大事，中央执监两会事前并不与闻，此举实为违法。弹劾文的领衔人是邓泽如先生，这个弹劾显然的给将近出台的国民政府一个大打击。我接到公事是在下午四时，第二天便要开常会 第三天国民政府便要宣告成立。事出非常 这件事怎样办呢 我不提出罢 我在职权上是违法 我提出罢 国民政府便难于如期成立。我想了一想，还是找仲恺先生罢。我打了几处电话，才知道他在省长公署开会。我通电话至省长公署找廖先生 据说他正在开会 不能接电话。我说这是十分紧要的事 非立刻通话不可，廖先生终于离开会议席，问我有什么急事。

“ 监察委员会刚才来一公事 弹劾中政会 说成立国民政府为违法 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廖先生一定事前不预闻的。

“ 我一点也不知道 是谁干的 ?”电话里廖先生的声音显然现着骇异。

“ 是邓泽如先生领衔的 你想该怎么办 ?”

“ 不要紧罢 明天在会议上把它打消便了。”

“ 我想不好 因弹劾是对中政会的 不是对个人的。我想最好通知胡先生 劝邓先生撤回。否则纵使能于明日会议打消 也著了痕迹。而且这几日间外边谣言很盛，纵使他们的弹劾不能成立 也于国民政府前途的印象不好。”我给廖先生一个贡献。

廖先生算是对于我的提议同意了，我立刻将原文亲自送至省长公署 并请廖先生无论如何夜间总要将原文送回 因若不能劝中监会撤销，翌日还须提出的。我心知这事情并不那样简单，若中执会没有委员同意，邓先生这个老实人绝不会擅自提出这种重大问题 并且非有大力的委员主使 邓先生也没有那样胆量提出弹劾。

那时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谁当第一任的国民政府主席。

在我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条例的当时 广州社会的推测 国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 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断 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 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 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 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 那也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 只是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 尤其他的夫人陈璧君不赞成他负那种大任。

胡先生为什么不被推为国府主席呢？也有近因，也有远因。那近因即是在这次杨刘之役 胡先生只赞成打杨而不打刘 现在杨刘既同被救平 即是主张同打杨刘者得了胜利 而胡先生算是主张上的失败者。加以在战争期中 胡先生似乎太过于冷淡 杨刘既灭 人望更是不归。至于远因则说起来很长 那是胡许的交恶。自革命二次失败之后，本来胡先生和许汝为先生很要好的，然而两个人的脾气总似先天似的合不来；胡先生素来自负聪明，而许先生则素来惯于骄蹇 只是一则在失败时期 没有可以冲突的地方 二是一个是文，一个是武，一时也没有利害的矛盾。一次他们终于破裂了 那是陈炯明反叛之后 许先生由江西回师救粤 不幸在北江失败 许先生便带领着残部 和黄大伟、李福林等军队去打福建 胡先生以文人在军无用 由江西间道回至上海见孙先生。胡先生是当时大本营的秘书长 论起失败责任 自然也不能完全诿卸。然而胡先生是素来自负聪明的，聪明人焉可以打败仗？所以虽然没有一定的要成则居功败则诿过，但至少对许先生下了许多苛刻的批评。许先生在福建时已经听见胡先生的评语 怒不可当 迨后来由福建回师广东 中途又打了几次败仗 孙先生对之更感不满。许先生以为孙先生对他不满 其故都由于胡先生的中伤 以一个素来骄蹇的人 自然更不会和他认为

对头的自负聪明的人合作。这次统一东江和救平杨刘，粤军第一军都建有殊勋，许先生是第一军名义上的主帅，这次改组国府，他倒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他于是结合了一般将领的力量，得了最高干部的同意，内外合力，共同拥汪，遂使胡先生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

以上的远因和近因都是胡先生的致命伤，除此之外，胡先生更素来好骂人，他的词锋尖酸刻薄，经他批评，身受者都有些像挖心之痛。当时军队的数量以许先生的粤军为最多，军队的素质以黄埔的党军为最锐，其次谭组安的湘军，朱益之的滇军，对于胡先生皆恶感多而好感少，在这种错综复杂情形之下，大家对于国府主席皆瞩目于汪先生了。

记得当日中政会的情形，大家差不多不欢而散。因为国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推定了汪先生，只把政治委员会主席让之胡先生，那种冷暖之情，已使胡先生极感不满。后来更因国府草创，仅先成立两部，财政部定了廖先生，而把外交部定了胡先生，胡先生便借题大发脾气，说他本人不懂外国语而任为外交部长，迹近玩笑，不待议终，当即发怒离席。鲍罗庭花了许多唇舌，扮作调人，说李鸿章也不懂外国语而为有名的外交家，在国府筚路蓝缕之时，非有一人才干如胡先生者不能胜任，这不是玩笑，而是大任。这样唇焦舌破才把僵局挽回。后来廖先生的被刺，西山会议的召集，种种恶因，都种于国民政府改组的当日了。

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夕，那真是危难四面，局促一隅。蒋先生由东江回师之时，陈炯明的军队又占领了东江重要城镇的惠州，且告失陷，南路则为邓本殷所据，渐渐迫近了江门。尤其困苦的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沙基惨案，省港罢工，英法兵舰云集广州，

差不多随时可以惹起严重外交，颠覆政府。然而时期已定，决心不再变更，国府终于七月一日依期成立，我也徇了汪廖两先生之约，任职广东省府的农工厅，兼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这是国府成立之前夕，且是我个人从事政治事业之始。

第二章

廖仲恺先生的被刺

国民政府成立之翌月 那就是八月二十日 廖仲恺先生被刺于中央党部的门首。

在廖先生未遇害的前两个星期 社会上已有若干的谣传说 某人对某人如何如何的不满 某派对某派如何如何的批评 某人和某人已被列名于杀害之列 一时谣诼四起 风雨满城。

就是八月二十之前两日罢，这种谣传已吹进了国民政府。有一次在会议席上 廖先生刚坐于汪先生的侧边 汪先生曾写一张条子给廖先生 说闻得有人将对于他不利 请他注意。廖先生耸耸肩头笑了 说：“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 那有什么关系！”

那日清晨 我刚到农工厅办公 中央党部的庶务科长刘陶打给我一个电话：

“廖先生被人打了。”刘陶在电话中的声音很急促。

“怎样打法？”我问。其时我的态度还镇静 因为广东话的“打”字含义太模糊 而且工会终日罢工 示威游行 互相斗殴 因打架而殃及旁人，事所常见。

“是用枪打的。”刘陶的声音显然露了颤抖。

“在哪里 不要紧吗？”我那时陡然忆起近来的谣言 知道事态很严重。

“在中央党部 现在已送‘公医’了 请你到‘公医’看他罢。”

电话立刻收了线，大约刘陶要赶到广东公立医院了。

那时农工厅的地址在西门内的光孝街，而公医院在东门外的百子路。那两所地址正处于东西两极端。我们那时做厅长的大多没有汽车，每天办公往来完全以人力车作代步。这样我要走到百子路，起码也要一个钟头。我立刻叫人雇了一部汽车。苦的是等了半个钟头，汽车还没有到。在等汽车的时候，心内真是又焦急，又悲痛，只有自己安慰着。希望所伤的不是要害，而且更幻想着，或者我到时，廖先生已包裹好已经出医院。

我到百子路时，已经是九点多钟。我进公医院门首，已有不少的人进进出出。我看多数的人都是中央党部的职员，面上露着沉默和严肃。其时刘陶已先到，我问他：“不要紧吗？”刘陶哽咽着说：“大概没有希望了！”我刚上楼梯，汪先生的眼已满含着痛泪走下来，一见我便说：“公博，你也得注意，暗杀名单内你也是有名的。”我其时只顾着看廖先生，对于汪先生的警告也无暇回答。

廖先生躺在一间病房的床上，鲜血满身，两只眼微微地睁开，眼球凝住，显然的再没有希望！医院那时显出混乱的情形，我看见廖先生再无回生之望，不觉悲从中来，禁不住大哭。廖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已止住了哭声，告诉我们廖先生被害的情况。

原来那天早上中央党部开会，廖先生是八时以前坐汽车去中央党部的。刚出百子路碰见陈秋霖，廖先生知道秋霖有事和他商量，拉他同车一起到中央党部谈话。汽车进了党部的门首，廖先生下车时，便见几个人由大门冲出来，开枪向廖先生射击。

“我当时只见火花缭乱，也不知道廖先生受伤，及见廖先生倒下地来，我也覆在他身上。我问廖先生受伤没有，廖先生已不能答，我于是抱他乘着原车到公医来。”廖夫人这样一边啜泣，一

边诉说。

眼见廖先生不能再活了，这是对于党国何等的损失！同时我已知道陈秋霖腹部也受了伤而凶手之一的陈顺已被邓泽如和廖先生的随从击伤，现在也抬到公医院疗治。我神态稍为安定之后便去探问陈秋霖那时他神色还很镇定只是医生不许我们谈话。至于凶手陈顺已受重伤，入了昏迷状态，看当时情形自然主使者大有人在而凶手也不止一人不过凶手重伤当然得不到口供等到他伤愈之后始可审讯。

正待重入廖先生的房间许汝为先生已来他告诉我们暗杀的名单共有八人，汪先生和我的名字都在内。汪先生那天因为手肿，没有到党部会议，否则或者已经和廖先生遭遇同一命运，也未可知。许先生并嘱我赶快到粤军总司令部一谈，因为缉凶善后非详细商榷不可。而且许先生说在这个时候没有卫兵是不行的，硬要派八个卫士跟我进出。

我们出了公医院便到粤军总司令部，那时粤军总司令部设在东门外省议会的旧址。总司令部的参谋们和副官们面上都露出惶惑和紧张，路上的行人和道旁的树木入我眼里似乎都在表示一种说不出的忧郁。无疑的这次事变是予国民党以重大的损失因为十三年改组国民党廖先生主持最力改组之后他赞襄孙先生也最多，这次损失固然难以计算，而今后国民党的前途，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已横了一重阴暗的云雾。

谁是幕后的主凶呢？在中午时候，情况渐渐明了。凶手陈顺昏迷时候频频呼叫“大声佬”，“大声佬”是朱卓文的诨名而且凶手被擒时候遗下一枝头号曲尺的手枪在广州当时人们有这类手枪是很少的。许汝为先生想起梅光培认识朱卓文，遂叫人找梅光培来，看他能否认得这枝凶枪的物主。